

“朝内”往事

文/丁帆

近说朝内的大院快要拆了,不由得心间悸动了一下,三十年前的许多往事涌上了心头。

1984年冬,我随叶子铭先生前往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茅盾全集》的编纂工作,走进朝内大街166号大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真的有一种神圣的敬畏感,倒不是那院子有多气派,而是见到了许多著名的编辑家和文学家,心中十分感佩。

编委会的主任委员是周扬。组建的“茅编室”是由叶子铭担任编辑部主任。

那时我正年轻,有一次让我突击编辑校勘《走上岗位》,拿到手的稿子是茅公用毛笔写在毛边纸上的手稿,我几乎三天三夜没睡觉,兴奋点都集中在那窥探欲中,就是透过台灯的灯光来琢磨、甄别手稿所书写的原来字句,也成为我校勘文论时的癖好,几个版本不同时期的修改,真是可写一部学术专著了,可惜那校勘稿我没留下备份,几年后想操刀著述,却无从下笔了。

在我一生最害怕接触不苟言笑的前辈,起初见叶子铭老师时也是战战兢兢的,因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但经过长久交往,能感觉到他人格的热度。王仰晨先生的勤勉赢得了上上下下的称赞,我对他还是有着莫名的畏惧感。当时他兼顾着三部全集的编纂工作:《鲁迅全集》《巴金全集》《茅盾全集》,其精力投入之大可想而知。我每每向他交稿都很忐忑,生怕出错。他偶尔来嘱咐几句,总是极简约的三言两语,指出勘误亦似漫不经心,但仔细回看却会惊出一身冷汗,这就是那种不着一句就让你一世谨记的人格

力量吧。永远记得他给我一封信中写的最后一句话:“年轻多么好!愿你永远年轻!”前些年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想起这句话,不禁热泪长流,是的,一个人在年轻时对青春的消费是毫无感觉的,进入暮年时才会体味到年轻的可贵。

“茅编室”遇到的最大一次危机则是人文社的《新文学史料》发表胡风回忆录时将茅公在1928年脱党后,也就是写完《蚀》后坐轮船去日本,在船上与胡风遭遇的情景描写公布于众了。那时最紧张的是叶子铭老师和茅盾之子韦韬,记得一个月夜,人文社小院里他俩影影绰绰的身影在墙角拐弯处闪现,一直谈到下半夜。其实今天看来,那段在“革命加恋爱”的史实当中,正是解读茅盾许多作品的钥匙,那“混合物”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成为左翼文学的开山巨制,谁说不是和这丰富而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心理紧密相连呢?而那时却是伟人之讳,今天看来是可笑之事,在那个岁月里人们的道德是没想象翅膀的。

《当代》编辑部就在“茅编室”的旁边。

那年时常见一些作家来改稿。常在食堂里看到河南作家张宇,他很健谈,把修改的路数一一和盘托出,因当时我正在从事乡土小说的研究。又常见甘肃作家邵振国穿着一双圆口布鞋蹲在院子里发愁,愁的是他那个《麦客》怎么“开镰”。贾平凹那时已算是不大不小的“客”了,因我1980年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论费的文章,与之过从甚密,平凹把“鸡窝洼人家”手稿先交予我看,哪知道《当代》某编辑打上

门来毫不客气地讨要,那种口吻真是离谱,倘若不是碍着平凹的面子,我真懒得理她。

最有意思的是蒋锡金来了!那天他从东北来,与我同住一个屋,是我在人文社很精彩的一日。

他是来见丁玲的,下午到了“茅编室”的宿舍就开始与我聊天,奇怪的是,他不喝我给他倒的茶,却从包里掏出一瓶烈酒,以酒代茶,对酒当谈起来。当然,聊天的内容一是与丁玲的交往,由此辐射到许多人和事;二是谈东北作家群。在1984年,能够亲耳聆听到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是多刺激啊,就像观赏情色影片一样。一直听他说书似的谈到晚饭时分,我要请他去食堂用餐,他坚辞不肯,说他不吃饭只喝酒。我只得买了两个馒头赶回,继续听他开讲。聊到夜里12点多钟,他竟然将一瓶500克装的烈酒喝光了。他亦不讲究,草草收拾就蒙头呼将起来了,我却回味在他那些轶闻中久久难眠。寐至凌晨三点,老蒋,不,蒋老!翻身下床,摸索着开了电灯,径直走到对门,不断敲打和拍打门板,我吓坏了,对门是一个带着婴儿的小媳妇,其丈夫是人文社的校对,恰好出差去了。俄尔,拍门声将息,少顷,敲门声又起,如此再三,声渐止,便听得哗啦啦一阵,而后便飘过了一阵阵异味。我赶紧呼唤:蒋先生……未料他进得门来,倒床便又呼将起来。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梦游!第二天他去了丁玲处了,留下的那异常气味与话题却在人文社里飘荡了好几天呢。

有趣有味的蒋先生的面影多少年来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

走向遥不可及的对方

文/齐红

说到底,这世上所有故事都逃不过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只是,有的故事性别存在感不那么强烈而已。孙频的故事却有着清晰、果断的性别指向:女性、男性,以及弥漫在交往中的性别意识。除此之外,她的小说还可用另两个关键词去描述:贫困——因出身、失怙、失恃导致的严峻现实;身体——不断跳出并横亘在生存中的肉体符号。难怪有人这么评价孙频的小说:她“有着极为精湛的叙事能力,能写出女人的各种绝望!如果你出身优越,正在一个咖啡馆里沐浴爱情阳光,你是不会懂得这种偏执狂一般的书写的”。

《三人成宴》同样是关乎男人女人的故事,他们无一例外地面临同样的结局:冲突难以消除,和解几无可能,伤害几乎是一种必然——这就是两性的宿命。这些男女有的已进入婚姻,有的一直单身,但有若无这个限定形式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永远处在一种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互相期待又互相厌倦、互相寻找又互相抛弃的困境之中。

《瞳中人》就是一个关于婚姻的寓言,这篇充分体现孙频故事驾驭能力的小说引导我们翻开婚姻的每个褶皱,直面、检视隐藏其中的尘埃与细菌。没人否认余亚静的婚姻是一个好婚姻,她的丈夫邓安城是一个好男人:老实顾家,对余的宠爱到了无原则的地步。但余亚静自己却总是感觉到两人相处中的荒谬与尴尬:凡事他几乎百依百顺,却难掩平庸、

世俗,常常心不在焉。最让余亚静不能忍受的一个习惯是,他在一切优美的艺术面前总会轻而易举地睡着:看电影时,赏花时,看画时。朋友们羡慕着余亚静的幸福,只有她自己清楚地知道面对这个男人空洞渺茫的眼神时,生活会有多么的无趣。

反抗绝望的方式就是离家出走,余亚静开始一个个寻找曾跟自己有暧昧关系的男人,这个计划听起来很有趣:一来可以测试一下有没有男人仍然爱着她;二来可以借机观看男人世界的“浮世绘”;三来挑战一下丈夫邓安城的底线,看他对自己的爱与容忍究竟到什么程度。但阅尽无数男人之后,余亚静非但没将自己救出绝望,反而陷得更深了。

婚姻内的男女挣扎着,婚姻外的男女也躁动不安,左冲右突,就是找不到走向对方的路径。陪酒女纪米萍不断向苏小军证明着自己的爱与纯洁,但最终,这证明却演变成一种纠缠、纠结、负担,让两个人都深陷疲惫……

这就是孙频小说中的两性,彼此之间有无可抑止的需要和渴望,但同时又会产生无法消除的紧张对立感。对峙与恐惧有多深,对话与和解的渴望就有多强烈,只是总不得其门,在自己的执念里扭曲着。这就是世上的男女么?——互相看得见,互相摸得到,却分明隔着遥不可及的距离,好在他们从未停止过迈向对方的脚步。■



雨巷 卞科

悦读 改变人生

“悦读改变人生”征文活动投稿邮箱:xdkbx-
ingzhe@126.com
具体征文要求与奖项设置详见2015年5月11日都16版
(可登录现代快报网打开电子版查阅)

1984年的蓝袖筒

文/庞余亮

1984年的蓝袖筒与一本被批判的书有关。

这本被批判的书叫《人啊人》,是戴厚英写的,写诗人闻捷的,而诗人闻捷,就是写《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的那个诗人。1984年,我在扬州的那所学院的大喇叭里,总是嘹亮着关牧村唱的这支葡萄遍地的歌。

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本书的。我曾去学院图书馆寻找此书,却被警惕性很高的女管理员看穿了。问我:“你借这本书干什么?”

是啊,我借这本书干什么?我总不能说是因为看到报纸上在批判这本书吧。

女管理员又问:“你是哪个系的?”

我说是某某中学的。这中学的名字是学院附近的。这是我对那所中学的栽赃。那所学校肯定没有我这样一个学生。女管理员相信了我。就如同我们学院的门卫总是怀疑我不是大学生一样。那时的我,17岁,体重不足45公斤,看上去就像发育不良的中学生。

女管理员放过了我。我的心却放不下总是在报纸上被批判的《人啊人》。

学院没有,我就出去找。想不到,在汶河路西侧的四望亭就找到了那本书。当时汶河路上的榆树很高大,老的四望亭里面不像现在空着,而是一个街道阅览室,

那里的书很多。管理图书的是一个戴着蓝色布袖筒的老人。

也许是没有多少读者,老人见了我很是热情,他说,可以办借书证的,学生证加两块押金就可以在四望亭里办一份阅览证。办证时,面对热情的老师傅,我的心还是有愧疚的。我已决定不还了。过了三天,我又去四望亭,假装很可怜地向阅览室的老人做口头检讨,说书丢了。老人看了看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装得很像),说两块押金不能还了哇。

虽然少了两块钱,但我暗中兴奋(这书本来定价一块三),但谁能想到,我去宿舍一炫耀,不出两天,《人啊人》真的就丢了。谁都说不没有看见,但谁都有嫌疑。

就这样,这本我用小计谋得来的书就这样离开了我。至今还记得里面的主人公,女主人公叫孙悦,男主人公叫何荆夫。因为太喜欢了,我三姐的孩子生下来,让我取名,就用了男主人公的名字。

很多年后,汶河路上的榆树没有了,四望亭和四望亭路也被开发出来了。我早就拥有了新版的《人啊人》。而那本有阅览室书线穿过的《人啊人》和四望亭里戴着老蓝布袖筒的老师傅就这样消失在记忆深处,我永远欠着他1984年的老扬州一个道歉。■